

## 第一部分 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成就辉煌的革命斗争史。  
70 多年来,特别是建国 40 多年来,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与自己队伍中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有效地维护了党和国家各级政权组织的纯洁性,为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并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回顾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总结并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反腐败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决心,对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措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一、反腐败斗争历史的简要回顾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 1. 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建党初期开始,党就十分注意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以高度的

自觉性，坚决抵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严格按照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的条件建设党。

迄今发现的我党最早的反腐败斗争文件，是 1926 年 8 月 4 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告》。当时，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向地主豪绅进行了阻止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的斗争，鼓舞和促进了全国各省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党还直接发动并组织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斗争，在各地逐步恢复被封闭的工会，推动工人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上海、武汉、北京、唐山、沈阳等地相继爆发工人罢工斗争，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起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如何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问题。正如党中央在《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革命潮流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通告》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分析了产生贪污腐化的原因，强调了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必要性：“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接到此通告后，“立即执行，

并将结果具报中央局，是为至要”。1927年5月，党的“五大”首次选举产生了党内纪律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初步建立了防止和反对腐败的专门机构。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找到当时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具体资料，也无法看到这个机构如何开展工作，但是，我们依然不难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已经在为维护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党的战斗力而做出种种努力。它是我们党运用自身组织保证党的肌体健康的开端，在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逐步由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红色政权纷纷建立。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事业，扩大胜利成果，巩固回到人民手中的权力，党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监察机构。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如发现在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有腐化营私贪污以及种种非阶级行动等，党及政府工农检查所，必须予以严厉的检查 and 处分。”1933年3月15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26号训令》，在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止，共查处了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者40多人。如：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检察了中央总务厅和瑞金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工作，对严重的贪污

浪费等问题，作出了严肃处理。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被撤职，管理处长徐毅被拘押审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兰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仁达被处极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则因官僚主义错误受警告处分。

1934年2月，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部长项英率中央工作组到于都县检查工作，发现县苏维埃军事部、县苏维埃主席、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与人合伙做生意，互济会主任挪用公款搞投机倒把，城区三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六个部长也合伙做投机生意。中央工作组对这些问题作了严肃处理。撤销了县委书记刘洪青的职务，改组了中共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枪决了四名贪污犯。原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受到撤销中央执委会委员职务、监禁一年并剥夺公权一年的处分，1934年2月中旬，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了中央各机关检举出来的一批贪污案件，并建议依法惩处。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59期，公布了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于都事件”检举查处的情况，以此教育苏区各级干部。在这次反贪污浪费斗争中，共检举、查处了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者40多人，其中厅长1人，局长3人，处长6人。送交法庭制裁者29人。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惩治条例，规定：凡贪污300元以上者要判处死刑。这一时期反腐败斗争的直接结果就是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极其困

难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2.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广泛地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时期的形势，如果从反腐败斗争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极为鲜明的特征：一是随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相当多的开明绅士、地主、英美派资产阶级、国民党员，甚至“哥老会”“青红帮”等都包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了。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和利益，都要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共产党进行腐蚀拉拢，国民党也改变了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变为对共产党人进行拉拢、吹捧，甚至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等手段进行腐蚀；二是在抗日根据地的多种经济成份中，私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剥削阶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就不能不对共产党员产生消极影响；三是随着革命营垒的扩大，国统区不少青年包括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青年纷纷投奔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有的还加入了党的组织，根据地的一些农民也纷纷要求入党。这就使党的成份更为复杂，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有了土壤和条件。当时军队中出现了少数人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的现

象，新军阀主义倾向有所抬头，打骂战士、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某团政委刘振环，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并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荣立战功，此时却贪污公款 500 元，并拒绝接受党组织的批评教育；从小参加红军，曾担任过旅长的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竟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有的根据地一度出现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有的乡长、区长贪污公粮、公款，有的县长用 600 多元公款为自己买一件皮袍，有的索贿受贿，有的用公款与商人合股，非法牟取私利，甚至发生了个别人携款叛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使我们党看到了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首先，制定有关规定、制度，严肃查处重大案件。当时，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同贪污腐化作斗争，一些根据地还颁布了“反贪污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如淮北苏皖边区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满 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一律追回非法所得；凡公务员，对贪污知情不报者，按情节轻重以渎职罪论处。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中明确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财物”、“敲榨勒索、收受贿赂”等 10 种行为为贪污，并按贪污数量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刑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

污行为。同时严肃处理一些严重违法违纪的人，刘振环被开除党籍，黄克功被枪毙，教育了党员、干部，提高了党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其次，加强正面教育，从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钢铁长城”。反腐败斗争，重在教育。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期间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党员干部的教育。1937年11月，他告诫全党要防止“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干部所实施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纪念白求恩》中，要求共产党员都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所有这些，都从正面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为从思想上牢固确立“反腐倡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1942年，我们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澄清了党内一些错误思想，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又以延安的整风为中心、为典型，故统称

为延安整风运动。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整风运动，使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当时，一位同志这样说：“如果参加党是我生命上的第一次大震动，使我的生命上附加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因素，那么这次整风运动是我生命上的第二次大震动，使我政治生命中共产主义的政治因素，提高到了自觉的程度，通过它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正之途径”，也“获得了改造的武器”。还有一位同志说：“原来自己是拖着未经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到共产党里来的，经过整风，自己照出自己的原形来了，再也不敢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冒充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了，再也不敢自命不凡了。我认识了我，我找到了改造自己的方向。我的心真正和党的巨大心脏紧紧贴在了在一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回到了正确路线上。延安整风的主题虽然不是反腐败斗争，但是，它在客观上对反腐败斗争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从改造世界观的高度奠定了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对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有效地从思想上铲除了腐败现象滋长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对宗派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有效地克服了在组织上、干部上出现的某些消极行为和腐败现象；而整风中所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则成为我党历来开展思想斗争，搞好纪检



监察的一贯方针。

延安整风之后的 1944 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荐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认真吸取李自成从起义到失败的沉痛教训，警惕骄傲腐败导致亡党亡国。

1945 年，毛泽东同志接见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在谈到共产党执政后是否会蹈明末李自成、清末洪秀全覆辙，如何跳出“其亡也忽”；“其兴也勃”的历史周期率时指出，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抗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上是成功的，理论上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 3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任务以及阶级关系也都发生了变化。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同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坚持不懈地同自身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一时期，除了加强党、军队和根据地政权的制度建设、防止腐败现象滋长外，更主要的是开展了整党运动。

这次整党是形势、任务，特别是加强党和政权组织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解放战争开始后，党的队伍以每

年平均增加 25 万名新党员的速度迅速壮大，成为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反动派的强大力量。但是党的队伍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十余年内，党员数量由 4 万发展到 270 多万，大批人进入党内，而审查不够严，手续不够全；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即使一些本质比较好的新党员，也缺乏经常性的教育和严格的组织生活。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直接侵蚀着党的健康肌体，损害党的领导，影响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由于党内存在的成份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土改中大量土地仍然保留在地主、富农手里，有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家的土地，可以说是原封不动。这是土改中一个极大的问题，也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一大障碍。有的干部不相信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习惯于在工作中发号施令，包办代替，甚至还有个别干部经常打骂群众。这种情况，在基层组织中尤其突出。正如刘少奇同志当时指出的：我们有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压制群众的作风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有的党员自私自利，为非作歹。有些人腐化堕落，贪污自肥，违法乱纪，已经成为蜕化变质分子。这种情形，很快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运动，通过思想打通、组织整顿、

纪律制裁，把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清除出党；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进行斗争。整党中，很多地方的党委实行“三查”，即查阶级、查组织、查作风，通过揭发、检举、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进行。将查出的一些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凡是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一律清除出党，有罪者依法逮捕。对犯错误的同志则进行批评和帮助，并视错误严重程度，予以必要的党纪处分，这就使党内一度出现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解放区的整党运动还促进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在整党中也整顿了村、乡、区政权机构，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权机关工作人员的制约和监督，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刘少奇同志曾称赞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形式，又是组织地方队伍的关键之一。这次整党，克服了党内的阴暗面，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正如毛泽东同志总结的那样，党和政府的组织内存在的那些情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我们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的重要报告中，特别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党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同志还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还以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对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的严峻性发表了一系列的英明论述，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在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既是我们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为以后在执政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围困、被追剿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党为巩固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避免重蹈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政权得而复失

的覆辙，采取了各种方式、形式和措施，同党和政权内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在清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条件和土壤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有益的探索。

### 1. 建国初期党及时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运动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土改，统一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医治了战争创伤，人民发自内心地高唱“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她辛劳为民族，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她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她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戴，也使我们的一些同志飘飘然起来，认为革命大功已经告成，因而放松了革命的警惕性，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国内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点，蠢蠢欲动，妄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颠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其阶级本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一方面，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手段，破坏国民经济，大肆向社会主义阵地进攻，另一方面采取“打进去”“拉出来”和施放“糖衣炮弹”的手段，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堕落的生活方式，对共产党和工人阶

级进行思想侵蚀。比如，当时上海大康药房的不法资本家，采用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先后把 25 个机关的 65 名干部拉下水。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拉拢下，党和政府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有的竟被“糖衣炮弹”所击中，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据 1952 年 1 月的不完全统计，中央人民政府系统 27 个单位查出贪污犯 1670 人。当时轰动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一案就是明证。这两个自幼投身革命，在敌人的酷刑和铡刀下不低头的革命者，解放后当了天津地区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他们丧失革命斗志，口口声声称“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不应当吗？”刘青山住进了豪华的“十八号别墅”；张子善则以“英明领袖张专员”自居。刚解放时还十分清贫、朴素的刘、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便“暴发”起来，他们公然置数万灾民的生死于不顾，盗骗了贷给灾民的 4 亿元（旧币，等于现在的 4 万元）救命款，侵吞了民工的好粮，高价卖坏粮，致使不少挖河的民工因吃了霉变的高粱米而染病死亡。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解决少数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党及时决定开展“三反”运动。1951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党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一系列指示，明确提出，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强调只有

这样，才能防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12月1日，党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了“三反”运动。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又在《元旦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抓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动员，限期开展“三反”斗争。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行为；绝大多数是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密切相关的。所谓“五毒”，即资本家借着当时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据1952年上半年审查，上海、天津等9大城市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的就有34万多户，占到总户数的76%；天津、广州、青岛、重庆、武汉5个城市不法商户偷漏税一项，即达25250万元。他们偷工减料，用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办法牟取暴利。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不法资本家采取各种恶劣的手法破坏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中有的用在垃圾堆里捡来的烂棉花做“急救包”，上海奸商用坏牛肉做罐头，

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使志愿军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和牺牲。

大量的事实说明，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是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并试图通过搞乱经济达到推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密切联系的。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同时除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斗争在各大城市开始，并很快掀起了高潮。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充分发动了群众，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经过“三反”“五反”这场激烈的斗争，不仅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帮助许多人划清了同资产阶级的界限，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侵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干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达383万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下同）以上的10万余人，贪



污的总金额大约 6 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 9942 人,判处无期徒刑的 67 人,判处死刑的 42 人,判处死缓的 9 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到 1949 年,全国党员总数已达 450 万人。绝大多数党员坚持和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猖狂进攻,统一市场、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斗争中,发挥了坚强有力的战斗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一些党员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正象毛泽东同志预料的那样,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受,停滞不前。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 1949 年一年新增加的 140 万党员中,有些人思想作风极为不纯,甚至有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这些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不纯的现象,如不及时解决,党就不可能胜利地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于是,党在 1950 年 5 月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接着,又在 1951 年的下半年开展了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对于党员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顿,是了解和教育党员的最实际的一种方法。经过这次整党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反腐败、反